



地方治理创新研究丛书

超越精英治理：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

顾金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地方治理创新研究丛书

超越精英治理：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



顾金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精英治理：农村能人队伍建设问题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
分析 / 顾金喜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7-5161-7379-4

I. ①超… II. ①顾… III. ①农村—地方政府—行政
管理—人才培养—研究—浙江省 IV. ①D625.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315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28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村能人队伍建设问题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研究”（编号：09CZZ024）研究成果，并得到了浙江省首批“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资助（编号：ZJQN2011G061）

目 录

导论	(1)
一 研究缘起	(1)
(一) 先富能人参政与治村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1)
(二)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事关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大局	(3)
(三)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有助于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7)
(四)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问题的研究有助于 基层治理研究范式的完善	(7)
二 文献综述	(11)
(一) 先富能人及精英治理等内涵的界定	(11)
(二) 先富能人治村的创新模式	(14)
(三) 能人治村的功能分析	(16)
(四) 能人治村模式的转型与完善	(21)
(五) 对能人治村及乡村精英治理研究的评述	(22)
三 研究方法	(25)
四 研究框架	(26)
第一章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的理论透视	(30)
一 人力资本及其增值理论	(30)
(一) 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	(32)
(二) 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主张	(34)
(三) 人力资本增值的路径	(42)
二 人力资本理论对农村能人队伍建设的启示	(45)
(一)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村能人队伍	(45)
(二) 建构多元化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服务体系	(47)

(三)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	(48)
(四) 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吸引乡村精英回归	(50)
(五) 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51)
第二章 农村能人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	(53)
一 新农村建设的内在动力	(54)
(一) 农村人力资源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动力和内生增量 ..	(55)
(二) 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57)
(三) 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增长动力	(59)
二 农村能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60)
(一) 农村能人的内涵界定	(60)
(二) 农村能人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65)
第三章 我国农村能人的角色变迁与先富群体参政	(84)
一 传统社会的乡绅自治及其瓦解	(85)
(一) 乡绅在传统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	(85)
(二) 乡绅“劣绅化”及其社会治理结构的瓦解	(88)
二 作为道德权威的农村能人：威权体制下的政令贯彻者	(95)
(一) 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结构重塑	(95)
(二) 新乡村权力精英的崛起和道德能人治村	(100)
三 先富能人：新时期乡村自治的引领者	(104)
(一) 先富能人治村现象的出现及其概念的辨析	(105)
(二) 农村先富能人治村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108)
(三) 农村先富能人参政的动机	(116)
第四章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125)
一 捐资竞选与选举的公平性、规范性问题	(125)
(一) 基层换届选举竞争白热化	(127)
(二) 贿选侵蚀基层民主政治环境	(130)
(三) 先富能人捐资竞选导致选举不公	(135)
二 先富群体竞选导致的新派系斗争问题困扰乡村自治	(139)
(一) 传统宗族势力复兴对乡村自治的影响	(139)
(二) 先富能人竞选导致的新派系分裂对村民自治的干扰 ..	(143)
三 农场能人治村的规范性以及治村能力问题	(147)

(一) 能人治村行为的失范导致乡村社会冲突	(147)
(二) 能人治村能力遭受现实复杂问题的挑战	(150)
四 行政吸纳与政策支持问题	(152)
(一) 行政吸纳及其不同的表现层次	(153)
(二) 基层政府对先富能人行政吸纳的客观必然性	(154)
(三) 基层政府对先富能人行政吸纳导致的问题	(156)
五 对先富能人治村行为的监督问题	(162)
六 培训与成长: 农村能人的发展与辐射能力问题	(168)
第五章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的指标体系建构与培育路径	(176)
一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的评价标准	(177)
(一) 品德标准	(179)
(二) 知识标准	(181)
(三) 能力标准	(183)
(四) 业绩标准	(184)
二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的指标体系	(186)
(一)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的数量指标	(187)
(二)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的质量指标	(190)
三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的途径分析	(195)
(一) 强化行政吸纳, 吸引乡村外流经济精英回流	(195)
(二) 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推进农村能人队伍建设	(200)
第六章 完善农村能人队伍建设的政策支持体系	(209)
一 实施农村人才投资优先保证的财政金融政策	(210)
(一) 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	(211)
(二) 财政支出突出对农村能人队伍建设的结构性扶持	(211)
(三) 实施农村人才投资优先保证的税收和金融政策	(212)
二 畅通农村先富能人参政渠道	(216)
(一) 基层政府治理结构和机制创新	(221)
(二) 基层治理规则重构, 嵌入农村能人的参政要素	(222)
(三) 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和角色重塑	(223)
三 实施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人才支撑计划	(224)
(一) 完善促进农村人才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	(224)

(二) 实施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人才支撑计划	(226)
(三) 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创业就业	(227)
第七章 创新乡村治理模式 规范能人治村行为	(230)
一 建构公平的乡村治理结构, 夯实乡村和谐治理的基础	(231)
(一) 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是乡村社会和谐的前提	(232)
(二) 公平分配是乡村和谐治理的保证	(232)
(三) 保障所有村庄成员正当权益和弱势群体的尊严底线 ..	(233)
二 完善村级选举制度, 选举德才兼备的	
先富人担任村庄“领头羊”	(235)
(一) 扎紧制度的篱笆, 严防违法乱纪与品行恶劣者当选 ..	(235)
(二) 完善竞选承诺制, 选贤与能	(237)
(三) 推行“协议村官”制, 确保履行竞选承诺	(238)
三 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防止能人治村的	
决策变异	(240)
(一) 完善村庄重大事项决策程序,	
强化对村庄决策制度的贯彻落实	(241)
(二) 大力推进民主恳谈, 促进村庄的	
有效整合与持续的稳定和谐	(243)
四 强化乡村治理制度的贯彻落实,	
提升能人治村行为的规范性	(247)
(一) 完善法律体系, 为村庄治理提供良好的制度规范	(247)
(二) 加强《村组法》贯彻落实力度,	
为规范能人治村提供制度保障	(249)
(三) 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化、规范化	(250)
(四) 强化村务公开制度, 提高村庄	
公共事务治理的公开化、透明化程度	(253)
五 强化对能人治村行为监督的长效机制	(254)
(一) 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 更好地	
监督先富人治村行为	(255)
(二) 落实村民集体罢免权, 依法罢免违规能人村官	(263)
结论 农村能人队伍的培育及对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超越	(272)

参考文献	(278)
附录 1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问题研究问卷	(307)
附录 2 访谈提纲	(313)

导 论

一 研究缘起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我国农村区域面积广阔,农村人口始终占绝全国人口总数的大多数。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民市民化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已达54.77%。^①然而,城乡二元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城乡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农村、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解决起来仍然困难重重。“三农”问题始终是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始终是决定党的事业胜利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②,“三农”问题也始终是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事关党执政兴国之根本大局。解决“三农”问题既需要党和政府加大对农村的政策倾斜力度,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也需要挖掘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的内生增量。在农村“空心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强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建设一支引领农村发展的领头羊队伍就显得尤为重要。本课题的研究主要缘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 先富能人参政与治村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深入推广,农村社会涌现出了一批批先富精英,他们在村民自治体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是推动新农村

^① 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15-02-26,详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建设的领头羊，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特别是近些年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迅速发展，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能人参政与“能人治村”现象非常普遍，2003年山西省河津市一个人均收入仅几百元的穷山村花194万元选出了个天价村主任，经《人民日报》报道之后曾轰动一时；曾经贫苦无依的农民企业家裴春亮被推选为村主任后回报乡邻，致力于裴寨新农村建设，2008年个人砸资3000万元建成160多套连体别墅，每户一套送给村民，让村民们都安居乐业^①；2008年，身拥5.8亿多元个人资产的韩城知名企业家、渭南市政协委员王文选则垫资1300余万元竞选村主任，向每位村民派发2万元，尽管引发贿选的质疑，却仍然顺利当选村主任^②；……这些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和治村行为都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并使得农村先富群体参政和“能人治村”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而近些年来研究亦表明，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能人治村”并非个别现象，即便在中、西部地区也已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近十年时间里，先富能人参与村级竞选并当选的比例不断创新高。从浙江省第八届、第九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情况来看，浙江省台州市的路桥、玉环、椒江、温岭四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中经商办企业的先富能人占比分别达到了82.6%、75.4%、73.9%、60.1%，该市占比最低的天台、仙居、临海也分别达到了39.8%、31.0%、30.7%。村委会其他成员中先富能人占比最高的路桥达到了83%，其次是椒江的75.2%、玉环的71.4%、温岭的51.1%^③，从数据中可看出，台州市当选的村干部中先富能人的占比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点，有些乡镇当选的村主任甚至全部是经济能人。但这一现象并非浙江省所独有，冯耀明的调研表明，从山西资源型地区富人当政的比例来看，75个村委会主任中较为富裕的有60个，占到调研总数的80%^④。不过，尽管“能人治村”现象日益普遍，“能人治村”也确实为农民脱贫致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甚至从冯耀明的调研来看，村民对富裕村委会主任的支持程度比例高达80%，但是众人对这一现象仍然褒贬不一。在此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先富群体参与农村政治

① 孙旭阳：《村官3000万为村民建别墅 跪求人到被跪求》，《新京报》，2008-12-28。

② 薛振宇：《韩城企业家垫资1300万元竞选村主任始末》，《华商报》，2008-12-19。

③ 根据台州市民政局提供的第八、九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报表整理、计算。

④ 冯耀明：《资源型地区“富人当政”：农村发展的双刃剑》，《理论探索》2008年第1期。

的动力何在?这一现象给农村的社会、经济带来了什么影响?其中的问题又是什么?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使之趋利避害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随着学界对农村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这批先富精英逐渐成为基层治理研究中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热点。有研究者甚至指出,“可以预见,乡村精英治理模式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农村是有生命力的。这种治理模式注定会成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①。从功能划分来看,作为农村能人的先富精英具有促进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正功能,也可通过捐资或竞选等方式兴办农村公益事业,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从而可有效地弥补体制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借助乡土权威的影响力,积极开展社区整合,发挥防范群体冲突;等等。一个突出的农村能人可以改变一个村庄甚至是一方乡土社会的发展与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在城乡二元分化特别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总体上并未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东西部差距日益突出和外部投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乡土社会或熟人社会的亲缘、地缘、血缘关系寻求农村社会发展的内生增量无疑就显得尤为重要,农村能人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更加凸显,特别是农村空心化、农业现代化、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等问题都需要在经济发展、利益关系协调、社会矛盾调处方面和在人民群众中拥有较高威信的能人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农村能人队伍建设对农村的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无疑具有特别重大的战略意义。以农村能人队伍的规范化建设带动农村发展、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绩效、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是本项目研究的核心关注所在。

(二) 农村能人队伍建设事关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大局

尽管“三农”问题成因纷繁复杂,既有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因素,也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不均衡的原因,当然更有当前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导致农村空心化和农村、农业发展人力资源匮乏的原因。这是多元因素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最终必须归结到

^① 赵爱庆、孙建军、赵佳维:《超越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政治抉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

人的因素上来,因为在人类所拥有的一切资源中,人力资源是第一宝贵的资源,也是唯一能够可持续地创造价值的主体。对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而言,人的因素特别是个体的智力和技能要素无疑也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为2.36亿^①,其中以农村人口为主。这么庞大的农村人口外流,往往又以青壮年为主,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业、农村发展缺乏基本的劳动力和农村的空心化。刘彦随等结合山东典型村庄调研和系统的理论分析指出:农村空心化本质上是在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非农化引起“人走屋空”,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逐渐向外围扩展,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闲置废弃加剧的一种“外扩内空”的不良演化过程。既包括农村土地空心化、人口空心化,也包括农村产业空心化和基础设施空心化,本质上是农村地域经济社会功能的整体退化。^②也因此更加凸显农村能人队伍建设的必要性、必然性和紧迫性;通过政策体系的完善,促使优秀农民工回乡创业也是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重要途径,更事关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大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非常显著,迅速从一个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但在时空压缩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如城乡失衡、区域失衡、行业失衡、群体失衡等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非常突出。当前我国农村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始终面临着多重束缚,农村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步伐始终跟不上城市的发展速度,以致城乡差距基本呈快速拉大趋势。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182.4元,收入比为2.37:1;1983年最低时曾经达到了1.7:1。但非常遗憾的是,从那之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基本呈扩大趋势,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点3.36: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则扩大到12022元;2010年收入比略有缩小,为3.23:1,差距则扩大到13200元;2011年收入比为3.13:1,差距为14833元;2012年收入比为3.1:1,差距增加到16648元;2014年收入比进一步缩小到2.96:1,但差距却持续扩大到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 2013-02-22。

^② 刘彦随、刘玉:《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地理研究》2010年第1期。

18952 元（详见图 1）。^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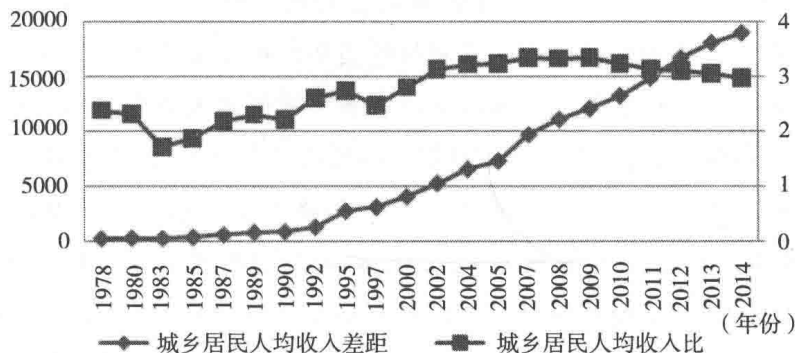


图 1 1978 年以来我国城乡差距情况

从图 1 可以清晰看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自 1983 年之后基本呈快速扩大趋势，2009—2014 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虽然呈缩小趋势，但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却仍在持续扩大，而且差距本身已经远远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

这种收入分配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以及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现象都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位格格不入，与社会主义本质明显不符，而且也与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相悖。毛泽东曾经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邓小平则非常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且他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②，“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④

有鉴于上述认识，邓小平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规划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就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并成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在 20 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的情况下，中共

① 主要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绘制。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25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95 页。

④ 同上书，第 123 页。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十七大报告则对此提出了新的要求^①，即提高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其中又特别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提出的“全面小康社会”应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但这种发展和富裕不是少数人、少数地区的特权，“全面”即意味着统筹协调，也意味着我们的发展应努力达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意味着全体国民，不论年龄、性别、种族、区域，都有富裕的权利和机会，从起点和过程上保证全体国民的共同发展，也意味着发展的成果由全民公平共享，最终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在结果上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战略构成上必然包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即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要加快农村、农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村社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但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究竟靠什么？应该以什么为抓手？毫无疑问，通过公共政策的权威性输出对社会资源、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使之向农村、农业倾斜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促进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新农村建设重要的外部动力。不过，任何发展归根结底都必须依靠人、为了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亦有类似的表述，他指出应当“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规模”，“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②。同理，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都必须依靠人、为了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对当前中国的农村来说，最关键的则是建设一支具有突出能力的精英队伍，既能够提升农业与农产品核心竞争力、带领广大农民致富，也能够创新理念、改变农村陋习、引领农村社会发展潮流和治理转型，以此为抓手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07-10-1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三）农村能人队伍建设有助于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由于人们在利益关系上的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将是一种普遍、持久的现象，也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最具有普遍性的矛盾^①，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引发利益冲突甚至社会冲突。因此，诚如亨廷顿所指出的，“现代性孕育稳定，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② 当前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因而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结构所导致的新旧价值观念冲突、发展失衡、体制磨合、两极分化、文化冲突碰撞等矛盾凸显，形成所谓的社会断裂与社会溃败现象。^③ 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农民本身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社会排挤，而且农民大量的土地被违规无序征用，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里征用土地，转手拍卖即获取高额差价，事实上形成对农民利益的进一步剥夺，导致农民的心理失衡，这也是农民大量上访和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的根本原因。农村能人由于其突出的能力，率先走上富裕道路，往往在农村社会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除了自己可以捐资捐物兴办村庄公益事业之外，还可以凭借自己累积的社会资本为村庄争取到更好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因此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所拥有的声望强化村庄公共决策的执行能力，可以有效对付“钉子户”，可以避免少数人在集体建设事业中漫天要价或搭便车^④，并强力推进农村土地征用。而且，农村能人由于其较高的威望还可以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重要的调节功能，对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农村能人队伍建设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基层治理研究范式的完善

近些年关于底层社会及其抗争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伴随着大量的外

① 余逊达：《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核心》，《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②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31页。

③ 孙立平：《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红网，2009-02-28。

④ 贺雪峰：《富人治村与“双带工程”——以浙江F市农村调查为例》，《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

文文献被翻译成中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底层社会或农村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国内学界在西方学者的影响下，运用抗争性政治的理论范式和逻辑分析框架对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进行了研究。

纵观研究，代表性的分析框架或观点主要围绕工人的“以理维权”、农民的“以法抗争”等展开。于建嵘的观点是，只有通过对当前充满悖论与矛盾的社会冲突性事件及其“底层人物”的意愿和行为的凝视，我们才可能清晰地看到隐藏在社会转型这一宏大话语背后的种种微妙因素，才能洞察和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隐秘”。由此，他提出了当代工人“以理维权”和农民“以法抗争”这两个解释性框架，并认为中国社会底层群体维权抗争的基本目标不仅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抗争，而且开始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①董海军深化了“依法抗争”的内涵，认为“以法抗争”与“依法抗争”之间的关键差别是群体行动的政治性的高低。根据他的观点，非政治化仍然是中国当前农民维权抗争基本特征，“以法抗争”等理解模式存在简单的政治化倾向。^②王洪伟则认为“以身抗争”与“以法抗争”是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他把“根据政策抗争”、“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理抗争”及“以关系网络抗争”等都纳入他的“以法抗争”模型，并根据近年来农民工跳楼讨薪涨薪、自焚性抵制强制拆迁或强制征地、个人权益受损者手刃直接利益相关者或非利益相关者等诸多群体性或恶性事件总结出所谓的“以身抗争”模型，一种特殊的抗争模式，意指抗争者以个人“身体”的破坏、自戕乃至毁灭为“武器”，为自身遭受侵蚀的权益向不公正的强势行政、强势资本进行有效抗争的手段或策略。^③但是在研究基层政治或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策略性均衡等分析框架说到底只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作为学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既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也不能照搬西方社会的理论

① 于建嵘：《底层社会的权利逻辑》，《双周刊》2008年第5期。

② 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008年第4期。

③ 王洪伟：《“以身抗争”与“以法抗争”：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2010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稳定与危机预警预控管理系统研究”论坛论文集》，2010年，第98页。